

李朝《昭明文选》接受考述

邸宏香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4;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32)

摘要:《朝鲜王朝实录》真实记录了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国至1910年灭亡绵延五百年的史实,是研究朝鲜与东亚各国历史及关系的基础资料。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后,引起了朝鲜文臣们的高度重视,他们大力推荐《文选》,一度欲将《文选》引入李朝的科举考试科目,这些在《实录》中都有体现。《文选》对李朝时期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朝鲜王朝实录》所见资料可以窥见《文选》在朝鲜李朝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关键词:《朝鲜王朝实录》;《文选》;中朝文化交流;朝鲜汉学;海外汉学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3-0183-07

被称之为“文章渊薮”的《昭明文选》(以下简称《文选》),选录了东周至南朝梁八九百年间130余位作者700余篇各体文学作品。其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后,不仅成为文人学习写作的范本,也曾在科举考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朝鲜王朝实录》^[1](以下简称《实录》)记述了大量有关的史料。

“朝鲜王朝”指李成桂于1392年建立、延续至1910年的王朝,国君姓李,也称“李朝”。从时间上看,李朝与中国相对应的是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朝。自太宗十二年八月七日(1412年),《实录》中就有了关于《文选》的记载。本文辑录了《实录》中与《文选》相关的史料,对其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探讨。

一、《文选》对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影响

在以诗赋取士的唐代,士子们必须精通《文选》,宋代更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以表达其在科举考试的重要作用,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李朝的科举考试。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新罗时期,在唐朝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早在新罗元圣王四年(788)就形成了“读书三品科”。其三品是以考试科目多少而定的。以《曲礼》和《孝经》为考试科目者为下品,以《曲礼》《孝经》《论语》为考试科目者为中品,以《论语》《孝经》

《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为考试科目者为上品,以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为考试科目者为特品。^{[2](4)}可见,《文选》为考试科目者为上品。

据《经国大典》记载,朝鲜建国之初生员试的考试科目是四书疑和五经义各一篇。四书疑比五经义稍易,四书疑是在四书中选取一个问题,让考生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五经义则颇难,即使皓首穷经,也未必做到通达五经。无论是四书疑还是五经义,出题均取其要旨,故有人做出标准答案传抄流行。考生无需做到通达四书五经,只将标准答案背下即可。这种做法曾一度使弊端日甚,至朝鲜朝后期科举作弊之风日炽,照抄流行的标准答案已如同茶饭般常事。^{[2](120)}世宗十九年(1437年,明正统二年),礼曹判书权踰曾有关于修习《文选》的建议:

礼曹判书权踰启曰:“方今学者有甚焉,不唯不读书,且以《文选》为不合举业,例以一时侪辈所述之文为得体,念诵不已。以此成风,学术日卑,莫甚于今。”上曰:“予于此事,何如而可也?兴学之术,全委卿等,可与大臣同议以定,予当从之。”(《实录》世宗78卷)

为通过科举考试,当时文人皆念诵标准答案的应考文章,对于《文选》这样当时不考的科目基本不修习,这是非常不妥当的。鉴于此,一些文臣学士开始谏言,让《文选》进入科举考试科目,并一以贯之。

明宗八年(公元1553年),大司谏尹春年主张献议,

收稿日期:2014-09-28;修回日期:2015-04-22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50年以来《文选》研究论著辑要”(吉教科文合字[2014]第254号)

作者简介:邸宏香(1977-),女,辽宁盖州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史

针对科举考试作弊、考试题重复等现象,提出在科举考试的正规科目中追加《文选》的建议。据明宗八年(1553,明嘉靖三十二年)6月9日载:

谏院启曰:……司马会试,讲《小学》《家礼》之时,生员试则许讲《文选》行文,进士试则许讲《文选》诗赋。略以上许赴会试,则《文选》可复盛行于今世矣。……

后三公议:《文选》讲取事,甚汗漫,且习律赋,则自当读之,义、疑换制事,儒生知五经者鲜矣,出五经之疑,则不得制之。……(《实录》明宗14卷)

虽然此建议被重经义的其他大臣反对最终没有被采纳,但《文选》在李朝的被关注度可见一斑。到光海君时期,文臣们直接提出《文选》作为进士试的必考科目。

据《实录》光海七年(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7月18日(癸亥)载:

礼曹启曰:“臣尔瞻于上年启辞中一款,以诗义、赋疑,换定监试初、终场,且以能诵四书者,许赴生员试;能诵《文选》或李、杜者,许赴进士试,请自后式年,为始施行事,已为启达,至于大臣收议以入矣。前头将有增广大举,例取生进,而其公事,尚未判下,京外士子,莫知所从,习功不专。请快垂睿断,以新作人之方。”传曰:“徐当发落。”(《实录》光海92卷)

李朝时代的生员和进士试是成均馆的入学考试,由礼曹会同成均馆一起组织。由上文可知,李尔瞻于万历四十二年就已经提出将《文选》列为进士考试的范畴。尽管这一举措历经一年仍未被通过,但足见文臣们欲将《文选》列入李朝时期科举考试的急迫心态。

至仁祖时期,《文选》入科举考试还是没有结果,但《文选》渐渐成为平民士子学习诗赋的范本。据《实录》仁祖十一年(1633,明崇祯六年)8月10日(己巳)载:

前日臣启辞中,《文选》、李、杜讲取等事,尚未判下。闾阎间士子,皆学《文选》、李、杜,多有兴起之望。其公事速下,幸甚。曹植书院,馆学儒生,亦颀望批答之速下矣。今此大庆,当为增广,但左相、兵判以为,莫如为别试而多取云,故臣当初不以增广直请矣。物情皆谓合二庆为增广,进定于二月宜当云,惟在上裁。(《实录》仁祖28卷)

尽管《文选》尚未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它依然是文人学习写作汉文诗赋的模范。李朝时期将儒教奉为国教,科举考试尤为重视四书五经,科举考试科目的变化也是影响《文选》在李朝传播的重要因素。李朝时期进士试考试科目经常变化,世宗十七年(1435年)六月重设进士试时,诗赋、排律十韵诗各一,各取50

名,之后进士试取消,到端宗元年(1453年)恢复,此前一年,即文宗二年(1452年)四月为恢复进士试制定试取标准,规定试古赋一,古诗和律诗二者择一。^{[2](120)}从《实录》所见材料不难看出,从世宗至仁祖,各朝各代文臣都力荐《文选》入科举考试的正规科目。

科举制度在李朝从1392开科到1894年废止绵延了五百年,几乎贯穿了整个李朝的历史。《文选》虽然没有正式入试李朝科举,自《文选》传入李朝以来,文人对《文选》的热度一直不减,仍然是李朝文人习作汉文诗赋的模范。从《实录》所见材料不难看出,从世宗至仁祖,各朝各代文臣都力荐《文选》入科举考试的正规科目。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或许是这一举措未果的原因之一。

万历朝鲜之役又称壬辰卫国战争、文禄庆长之役,《实录》对这次战争有过详尽的叙述。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率军攻占朝鲜,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这场长达七年之久的战争,对当时的东亚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最终以中朝两国正义的胜利而告终,但却使明朝和朝鲜由盛转衰,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使得女真迅速崛起。此后,明朝的政治、军事统治优势逐渐为后金取代,女真与其邻国朝鲜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建立了新的国家关系,后金还取代明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形成了新的东亚政治格局。^[3]笔者认为,战争导致的易主是《文选》迟迟未列入科举考试科目的重要因素,由于易主导致以事大为主要外交手段的朝鲜对一些举措迟迟未兑现也是情有可原的。

无论诗、赋是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文选》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目。《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的隆文楼书目中收《文选律赋》十六卷,大概是从《文选》中摘抄出来的律赋。

二、《文选》对李朝外交政策的影响

“事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外交理念,是在强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小国侍奉大国以自保的策略。《孟子·梁惠王》中有“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朝鲜受汉文化影响深刻,将中国看成学习和模仿的榜样,有着传统的“慕华”“事大”倾向。《实录》中宗96卷有“且事大之事,甚为重大”。例如李朝的质正,包括质正服饰、避讳、礼乐、语言、法律等各类制度等,是李朝所施行的历时已久的一种“慕华事大”审定制度。李朝非常重视汉语官话“质正”制度建设,把汉语官话

质正看作是关乎“事大”成败与否的关键之所在。^[4]世宗十九年(1437, 明正统二年)9月3日载:

判中枢院事许稠启曰:“国学儒生,全习词章,不读经书,弊固不小。此无他,科举不讲经故也,若复行讲经之法,则自不能不务实学矣。”上曰:“予每念此而未定。太祖朝始立科场讲经之法,太宗朝权阳村每请罢讲经,予亦熟闻其说,是岂不察而言之欤?……大抵熟于经书为贵,其文章之类,无益于国家,特以事大交邻而不弃之耳。若知大体,不失于礼义,则虽曰疏于文词,何伤乎哉?”(《实录》世宗 78 卷)

朝鲜对中国奉行“事大”的外交政策,同时特别重视外交文书的重要作用,诗赋外交弥补了两国政治交往的不足,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朝鲜通用的文字是汉字,从正史至士人著述,以及科场答卷都是用汉字书写。

据《实录》明宗八年(1553, 明嘉靖三十二年)6月9日(甲申)载:

谏院启曰:“文章之有关于国家,岂不大哉?道之盛衰,于此而决焉;治之汙隆,由是而判焉。近自四五十年来,上之所尚者,徒屑屑于虚文;而下之所应者,徒区区于末技。年以年甚,日以日甚,所谓文章者,不可谓文矣。事大之表,孰能作之;交邻之书,孰能制之?今欲顿变文风,复祖宗之旧规,则不可不参酌时宜,变而通之。今之议者曰:‘四六之体,儒者不讲,表、笺专不用功。其在前朝,赋用律体,取人之时,许诵《文选》,故人人皆习于四六。为今之计,一切取人之际,赋体皆用八角,而东堂会试录名之时,《文选》行文,并与《大典》《家礼》而讲之。’……议者又曰:‘科举事目,外方不能详知,律赋之体,知者甚少,不可不印出而颁布也。况《文选》之书,我国甚贵,亦不可不广布,而其注之详密者,莫过于李善注,速为印出甚可云。’”(《实录》明宗 14 卷)

以四六骈体文为格式的外交文书在“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中起到重要作用,《文选》作为四六骈体文的典范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上文可知,《文选》在李朝受到重视的原因,不仅在于“事大之表”和“交邻之书”等表文和国书的撰写上发挥重要借鉴作用,而且在行文方式上也要借鉴《文选》,且《文选》这样的书在李朝很难得到,故明宗时期选择注释详密的李善注《文选》快速印出,以广泛传播,足见《文选》在李朝时期培养人才、行政公文的书写及外交方面的作用和价值。

我们通过朝鲜文学可知,新罗至王氏高丽的教科书,《文选》被视为首要必选。被称作汉学始祖的崔致远是入唐登科的佼佼者,他的文章取法四六,很多作

品都深受《文选》影响,被尊为东方文章之祖。

据《实录》成宗六年(1475, 明成化十一年)5月7日(乙卯)载:

御昼讲。上谓知事徐居正曰:“后世文章,如古文乎?”居正对曰:“古人有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者,文章之盛,莫如三代、两汉,东汉又不及西汉。后世文章之盛,莫如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苏轼,然亦岂能如三代、两汉乎?新罗时能文者必多,史籍不传,存者不过崔致远一二人而已,高丽中叶以上之文,亦不多见,今之文不及高丽,中朝之文,亦不及元朝之盛。”(《实录》成宗 55 卷)

崔致远存世的散文集《桂苑笔耕集》中收录的大都是行政公文,形式大多为骈四俪六,因整个唐代朝廷的公文都是采用骈文。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自六朝以来,到了唐代,骈俪文的势力,深入于朝野人心,连民间小说也受到了这种影响,更何况朝廷上的公文也非用这种格调不可,骈至成了‘四六文’的一个专门名词……在正式的‘公程式上’的这种文体,自唐以来,还延长寿命很久。”^{[5](169)}

崔致远的文学成就对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李氏王朝时期学者洪奭周在《校印桂苑笔耕集序》中对崔致远作了高度评价:“吾东方之有文章,而能著书传后者,自孤云崔公始。吾东方之士,北学于中国,而以文章声天下者,亦自崔公始。”^{[5](172)}崔致远为弘扬和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新罗朝廷的很多外交文书都出自他手,他既是朝鲜古代汉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

朝鲜建国之初就实行“修职贡,奉皇明”的政策,对明朝行“事大”之礼。开国功臣权近赴明是诗赋外交的典范。权近(1352—1409)是高丽末期、李朝初期的哲学家,历任大司成、艺文馆大提学、议政府赞成事等职,凡经国外交文字,多经他手。他不仅是李朝的重要儒臣,也是朝鲜朱子学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对李氏王朝的巩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还是李朝出使明朝的重要人物。权近一生曾两次出使明朝^②:在两国关系最低点时,为得到承认和册封出使明朝,并以诗歌形式记录了赴明沿途所见所闻,突显了权近的外交功绩和文学才能;做二十四篇“应制诗”,据太祖六年(1397, 洪武三十年)载:“初,近入朝,帝赐对,知近有学识,命题赋诗二十四篇,近应制。”(《实录》太祖 11 卷)表白了朝鲜的“事大”之诚,并得明太祖朱元璋“御制诗”三首,成功化解了“表笺事件”,缓和了两国间的外交矛盾,也是明朝与朝鲜关系史上第一次“诗赋相赠”,为两国的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事大”是李朝一直遵循的国策,光海七年(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6月18日(癸巳)曾有这样的记载:“我国接待华使之际,专以诗律唱酬,至于华国,岂曰小补?”(《实录》光海91卷)

李朝末期学者朴趾源(1737—1805)关于明朝与朝鲜关系的一段论述颇为精辟:

呜呼!皇明吾上国也,上国之于属邦,其锡赉之物虽微如丝毫,若陨自天荣,动一城庆流万世。而其奉温谕虽数行之礼,高若云汉,惊若雷霆,感若时雨,何也?上国也。何为上国?曰中华也。吾先王列朝之所受命也。故其所都燕京曰京师,其巡幸之所曰行在。我效土物之仪曰职贡,其语当宁曰天子,其朝廷曰天朝,陪臣之在庭曰朝天,行人之出使我疆场曰天使,属邦之妇人孺子,语上国莫不称天而尊之,四百年犹一日。改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昔倭人覆我疆域,我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师东援之,竭帑银以供师,复我三都,还我八路,我祖宗无国而有国,我百姓得免雕题卉服之俗,恩在肌髓,万世永赖,皆吾上国之恩也。^[6]

这段话体现出朝鲜对明朝的信赖和尊崇,是一种“慕华”心态。外交本严肃且无小事,特别是处于大国之畔的小国,言辞稍微不慎便会引起争端。在明朝与朝鲜的外交中,诗赋外交是两国最具特色的外交方式,其主体是两国的文臣儒士,在完成各种常规的外交任务之余,通过双方的诗文唱和,在相通的文化基础之上进行思想交流和沟通情感,进而解决两国关系中的疑难问题。朝鲜赴明使臣曾说:“中朝待外国甚严,而待我国则甚亲厚。”^[7]诗赋外交成为两国文士之间情感沟通的基础,也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因而,李朝尤为注重诗赋和骈文的训练,故而《文选》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三、《文选》成为李朝士人必读之书

朝鲜历代封建教育制度都借鉴和吸收了相应的中国教育制度,不可避免地在教学与考试内容方面也主要选择中国儒家经典著作,《文选》也被纳入其中。如新罗时期,国学主要讲授中国儒家经典著作,亦分班级教授其他不同内容:“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教授之。”^[8]从新罗国学所列的教学科目可以窥见,《文选》是其所选择的唯一

偏重文章修炼的科目。

成均馆是朝鲜半岛历代王朝最高学府,地位等同于古代中国的国子监。为了与元朝国子监相区别,高丽国子监于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改名为成均馆。^{[2](29)}成均两字取自《周礼·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据《实录》世宗十七年(1435,明宣德十年)6月26日(丙寅)载:

集贤殿大提学李孟昉等启:“谨按《元典》文科程式,乡馆会试中场,出表、论、古赋中二题,生员试疑、义各一道,行之四十年于兹,其劝勉经术之方备矣。独诗学专废,大小文士不知诗法,非惟一身之艺不全,抑亦有阙于国家之用,不可以末技偏废。……成均馆生员经学余暇,兼习《楚辞》、《文选》、李、杜、韩、柳、欧、王、苏、黄等历代诸家诗、《春秋》。”(《实录》世宗68卷)

集贤殿是世宗时期的李朝政治、军事、科技等学问的研究机关。为迎合这种教育制度,集贤殿大提学李孟昉等提议,成均馆生员需要兼习《文选》。

在李朝的贵族子弟中,《文选》同样备受关注。据《实录》世宗二十六年(1444,明正统九年)12月7日(壬子)载:

广平大君珣卒。珣字焕之,号明诚堂,上之第五子也。……自少力学,通《孝经》、小学、四书、三经,遍阅《文选》、李、杜、欧、苏集,尤长于《国语》《左传》,至于音律算数,亦极其妙,善属文,书法亦妙。挽强射远,又能击球。(《实录》世宗106卷)

广平大君自幼阅读《文选》,可见《文选》在贵族启蒙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8世纪中叶,即景德王时期国学改称太学监,任务是收取15至30岁的贵族子弟入学,学制9年。所授科目有必修的儒教经典《论语》《孝经》,辅以《五经》《文选》。^{[2](3)}

不仅是成均馆生员和贵族子弟修习《文选》,《文选》传入李朝之后,深得上至国王下至百姓的喜爱,尤其是深得李朝文臣的偏爱。《文选》也是大臣与国王讨论时的重要文献依据。宣祖时期,国王与大臣夜晚在研读《通鉴纲目》时曾引用《文选》中的注释。据《实录》宣祖二十一年(1588,明万历十六年)1月8日(壬辰)载:

召夜对。初更,上御便殿。参赞官李诚中,侍读官吴亿龄,检讨官卢稷,记事官尹洞等入侍,进讲《通鉴纲目》。……稷曰:“臣亦未知见于何书,但《文选》注中,有此言。”(《实录》宣祖22卷)

由上文可以看出,文臣们几乎将《文选》内容烂熟于心,在为国王轮讲时可以随口举出《文选》作为文献依据,可见《文选》在李朝时期的接受程度。

在某种程度上,《文选》也影响了李朝时期的文风,据《实录》宣祖三十年(1597,明万历二十五年)3月12日(壬寅)载:

上曰:“杨布政使亦何如人。”……根寿曰:“臣入朝时,望见于军门外,不与接谈。其制宋经略《东征纪事》序文,似《文选》甚好矣。”(《实录》宣祖86卷)

李朝时期的文臣们若非博闻强记,则必是每日诵读,所以在为国王轮讲时才可以出口成章,借引《文选》之典故,可见文臣们用力之深。《实录》宣祖三十六年(1603,明万历三十一年)8月30日(癸丑)曾载:

癸丑/卯时,上御别殿,讲《周易》。……上曰:“修养引年者,有之;化仙,则必无之。理也。昔嵇康虽好仙,而《文选》言无神仙矣。白日生羽翰,岂有其理?”(《实录》宣祖165卷)

到李朝光海君时期,大臣李尔瞻曾正式提出监试轮讲李、杜及《文选》并得到应允。据《实录》光海七年(1615,明万历四十三年)6月18日(癸巳)载:

礼曹启曰:“前日臣尔瞻启辞中,请以李、杜、《文选》为监试、轮讲者,正为此而发也。近来诗学专废,闾阎初学之士,虽欲业诗,无从传学。曾以进士成汝学,愿为诗学教官,呈文于本曹者非一。请依私教官例,专掌诗学,善诱童蒙,以期作成之效。”传曰:“允。”(《实录》光海91卷)

监试,即监督考试之意,亦指科举考试时负有监督之责的官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铨试》:“朝廷遣监试、主文、考试等官,就礼部贡院放试。”平民百姓及初学之士,业诗无门,可由专人做诗学教官,讲习李、杜及《文选》。到李朝英祖时期,“命儒臣,持《文选》入侍”^⑧。持《文选》入侍已经变成文臣们必须遵守的命令。

在朝鲜,在盛唐诗文和宋代欧苏传入并被消化、模仿之前,文选体——以美句骈俪为特色的六朝文风一直在这里居统治地位,长盛不衰。诸如朝鲜这样在语言、文字、风俗皆有异的外国人欲学习中国诗文,《文选》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诗文集范本。^[9]

四、《文选》在李朝时期的版本问题

《文选》传入李朝后,由于这类书特别珍贵,故流行并不十分广泛,而且在版本上也有了优劣之分。如果遇到好的版本,诸如《文选》李善注等,则必会快速刊印,以方便儒生们查阅。据明宗八年(1553,明嘉靖三十二年)6月9日(甲申)载:

议者又曰:……《文选》虽不在讲例,乃四六之祖,甚切于儒生读习,依谏官所启,李善注本,下送全罗道刊板。……(《实录》明宗14卷)

由于《文选》的地位及其在李朝的影响和接受程度,采书官们见到此书就会搜集,导致出现了各种版本及各种品相的《文选》,如若无条理或有破损之处,则需要整理修复之后才得以收入弘文馆。据宣祖二十七年(1594,明万历二十二年)10月24日(戊辰)载:

传曰:“《新增类合》《小学集说》《小学谚解》《周易大全》《周易谚解》《易学启蒙》《孙》《吴》《黄石公》《文选》《舆地胜览》《大典》等册,内入。”政院回。启曰:“问于弘文馆,则或不秩,或陋破。请改妆以入。”传曰:“依启。”(《实录》宣祖56卷)

《文选》传入朝鲜半岛的版本,除李善注、五臣注之外还有其他的版本。韩国学者金学主在《朝鲜活字本〈文选〉研究》中曾提出,朝鲜时代所印以五臣注为主的《文选》有别于中国见到的五臣注。但由于这些书在当时的朝鲜非常珍贵,而且传播得并不广泛,文臣们收集到好的版本,首先想到的是进献国王。据宣祖三十六年(1603,明万历三十一年)3月14日(庚午)载:

上御别殿。……上曰:“何样书?”好闵曰:“皆抄集矣。臣亦买来,尚不得见。”上曰:“与杜预注不同,何耶?”好闵曰:“臣未知其优劣,不敢妄论。臣曾读《文选》,五臣注外,亦有别本一注。上欲印看,故不敢留于家,曾进献矣。”上曰:“方印他书,力不暇及。卿其将去读之。”(《实录》宣祖160卷)

由上文可知,《文选》传入李朝的抄本,珍贵且少见,文臣买到以后,不敢私自留下享用,必先进献给国王。可见《文选》稍好的版本,唯有文臣和国王才有机会看到。

朝鲜李朝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文选》多次刊刻,反映了朝鲜社会对《文选》的需求,也是朝鲜朝文选学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10]从版本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李朝时期对《文选》的高度重视。光海五年,朝廷曾下令广泛搜集所需书籍的官修本或最好的版本工作。光海五年(1613,明万历四十一年)12月3日(丙戌),朝廷曾下令:

传曰:“《春秋》四传、《通鉴纂要》《杜氏通典》《玉海》、李善注《文选》各一件,奏请之行,并以官本,极择贤来。”(《实录》光海73卷)

上述书籍内容涵盖了政治、文化、文艺等方面,体现了光海君的治国需求,这其中就包括《文选》,光海君时期需要上述书籍的官修本,并且挑选好的版本购买。这项政策也极大地推动了李朝的书籍编修工作,使得大批史料得以保存。

我们从《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中发现其收录《文选》版本共12种。以私家书目清芬室书目为例,其收录的《文选》不仅有残卷还有散页,具体为《文选》零本二册、《文选》零页、《文选》残本一卷一册、《文选》残本四卷四册共四个版本的《文选》。^[1]其中,《文选》零本二册指梁昭明太子撰五臣注存卷一至二卷十三中宗朝刊,木板,四周单边有界,十行十七字,注双行,匡郭长二二点五厘乃至二五五厘,广一七点五厘,白口或黑口,首有进集注文选表及序,参照黑田亮博士著《朝鲜旧书考》一七五页;《文选》零页指世宗十二年庚戌庚子字刊本,六臣注存卷三十八第三十四五六凡三页,四周双边有界,每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注双行,匡郭长二三厘,广一五点三厘,黑口。按世宗实录卷五十,十二月丙子赐铸字本古文选于宗亲及文臣云者盖谓此书也。

清芬室书目是李仁荣个人藏书目录,且为手写本。其书目“一无惊人秘笈,然于其中犹有略窥古文化之一端焉”。我们从朝鲜私家藏书中可以窥见《文选》的重要性,在收集《文选》版本时,连只言片语都收集在册,爱护有加。

五、《文选》对李朝总集编纂的影响

为了完整地保存《实录》,使之流传后代,李朝设置了史库。在李朝前期,《实录》分别保存于首尔的春秋馆和忠州、全州、星州等地的交通方便、人口密集之处,忠州史库从高丽朝起就承担着保管《实录》的重任。太宗十二年(1412,永乐十年)8月7日(己未)载:

命史官金尚直,取忠州史库书册以进。……《前汉书》《后汉书》《文粹》《文选》《高丽历代事迹》《新唐书》《神秘集》《册府元龟》等书册也。且命曰:“《神秘集》,毋得披阅,而别封以进。”上览其集曰:“此书所载,皆怪诞不经之说。”命代言柳思讷焚之,其余下春秋馆藏之。(《实录》太宗24卷)

这是《实录》中较早记载李朝史库保存《文选》的文字。同时,史库还保存了其他大量的中原文献,内容涉及医学、文学、语言、兵法、历史、总集等,经国王审阅后,《文选》等文献被藏入春秋馆。

李朝时期,史馆称春秋馆,春秋馆是编纂《实录》的机构。从基础资料的起草到实际的编纂和刊行,所有工作都由春秋馆的史官负责。史书从忠州史库移到春秋馆收藏是为了方便查阅和编纂,《文选》也在众书之列,说明当时对《文选》的重视。

据成宗六年(1475,明成化十一年)5月7日(乙

卯)载:

御昼讲。……居正曰:“世道降而气渐漓也。我国之文,无选集者,前朝惟崔湑,当撰《东人文》。然伤于略,臣等欲仿古文选,自新罗至我朝,类选诗文,今已衰集,时未成书耳。”上曰:“第撰之,当印颁。”(《实录》成宗55卷)

《文选》的编纂体例也引起了李朝的高度重视,这是徐居正与成宗进行御昼讲时,谈及欲效仿《文选》,搜集新罗时期至今的诗文,编印《东文选》,此举得到了成宗的认可和支持。《东文选》是徐居正主持编纂的一部诗文并举的通代文学选本,所选作品上迄三国,下至鲜初,其中很多作品涉及中国的政治文化与文学艺术。《东文选》书名源自《文选》,以文体为序,赋、诗、文进行相应分类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编排,其在文体分类上受到《文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另据《实录》中宗十三年(1518,明正德十三年)7月12日(己酉)载:

○撰集厅堂上申用溉、金铨、南袞等,进所撰《续东文选》。其进笈曰:……爰述成庙之遗意,俾续《文选》之余音。……(《实录》中宗34卷)

不止是《东文选》的编印受到《文选》的影响,中宗年间申用溉、金铨、南袞等撰《续东文选》的编纂也借鉴了《文选》。

六、结语

《实录》中自太宗始,世宗、成宗、中宗、明宗、宣祖、光海君、仁祖、英祖、纯祖等都有关于《文选》的相关记载。其中,世宗、宣祖、光海君时期提及次数最多,问题大多集中于《文选》对科举的影响及李朝士人的必读书目方面。我们从《实录》中所见史料不难看出,《文选》在李朝时期能够得到与儒家经典并重的地位和关注度是有原因的。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大背景,由于科举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最重要的途径,为找寻更多入仕的门路,《文选》进入了文臣们的视野,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其次与朝鲜王朝所信奉的“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有关,这种“事大”政策与朝鲜王朝相始相终,朝鲜王朝能熟练运用骈文及彰显文化的各种诏、册、令、表、启、赞、论等文体,是保持与中国具有稳定外交关系的必要条件,《文选》作为李朝诗赋外交文书的写作模范超越了其本身的文学价值。再次,《文选》在李朝的传播和接受,得力于众多文臣的喜爱。由于文臣们对《文选》推崇备至,导致李朝对《文选》的需求增大,故其传播迅速,且李朝

时期《文选》之书异常珍贵,采书官们不计版本的好坏,见到《文选》就引入,于是有了五臣注、李善注、六臣注等各种《文选》的版本。根据实际需求,《文选》在李朝时期得到大量刊印以广泛传播,如《文选》六臣注本有世宗十年(1428年)的活字本,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由于《文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文学、历史及文献学价值,传入朝鲜半岛后,一直活跃于国王、文臣儒士以及闾阎间士子等不同的受众群体中。不仅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更是科举时文臣力举的考试科目,尤其得到李朝文臣们的大力接受和高度重视,对朝鲜民族的政治、外交、文化乃至文风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注释:

- ① 《朝鲜王朝实录》凡 1893 卷 888 册,自朝鲜第一代君主太祖(1392—1398)至第二十五代君主哲宗(1849—1863)共 472 年的历史,主要记载了当时的政治情况,涉及了军事、经济、制度、法律、外交、社会、文化、风俗、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199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记为世界纪录遗产。
- ② 1389 年(明洪武二十二年,高丽恭让王元年)第一次出使,1396 年(明洪武二十九年,朝鲜太祖五年)第二次出使。
- ③ 《英祖实录》118 卷,四十八年(1772,清乾隆三十七年)1 月 28 日载。

参考文献:

- [1]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朝鲜王朝实录[M]. 首尔: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1.
- [2] 李成茂. 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3] 金洪培, 黄文日. 万历朝鲜役及其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J]. 东疆学刊, 2007(4): 39-41.
- [4] 李无未, 张辉. 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考论[J]. 古汉语研究, 2014(1): 2-4.
- [5] 李岩, 徐健顺. 朝鲜文学通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6] 朴趾源. 燕岩集[M]. 汉城: 庆熙出版社, 1969: 237.
- [7] 吴晗.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2)[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713.
- [8] 金富轼. 三国史记[M]. 孙文范等校勘.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460.
- [9] 金台俊. 朝鲜汉文学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24.
- [10] 季南. 《文选》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价值[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49-51.
- [11] 张伯伟. 朝鲜时代书目丛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A study of acceptance of *Anthology of Zhaoming* by Li Dynasty

DI Hongx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32, Chin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32, China)

Abstract: *Record of the Joseon Dynasty*, recording truly the long history of 500 hundred years of Li Dynasty (1392-1910), is a very important resource to resort to in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 and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fter *Anthology of Zhaoming* which was edited by Zhaomin Prince, XiaoTong, was spread to ancient Korean Peninsula, it arose tremendous attention from Korean officials. They commended it greatly, and once meant to bring it in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Li Dynasty, all of which were reflected in *Record of the Joseon Dynasty*. *Anthology*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politics, diplomacy, culture and so on in Li Dynasty. From the references in *Record of the Joseon Dynasty*, glimpses can be caught into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that *Anthology* had in Li Dynasty.

Key Words: *Record of the Joseon Dynasty*; *Anthology of Zhaoming*;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Sinology in Korea; Sinology overseas

[编辑: 胡兴华]